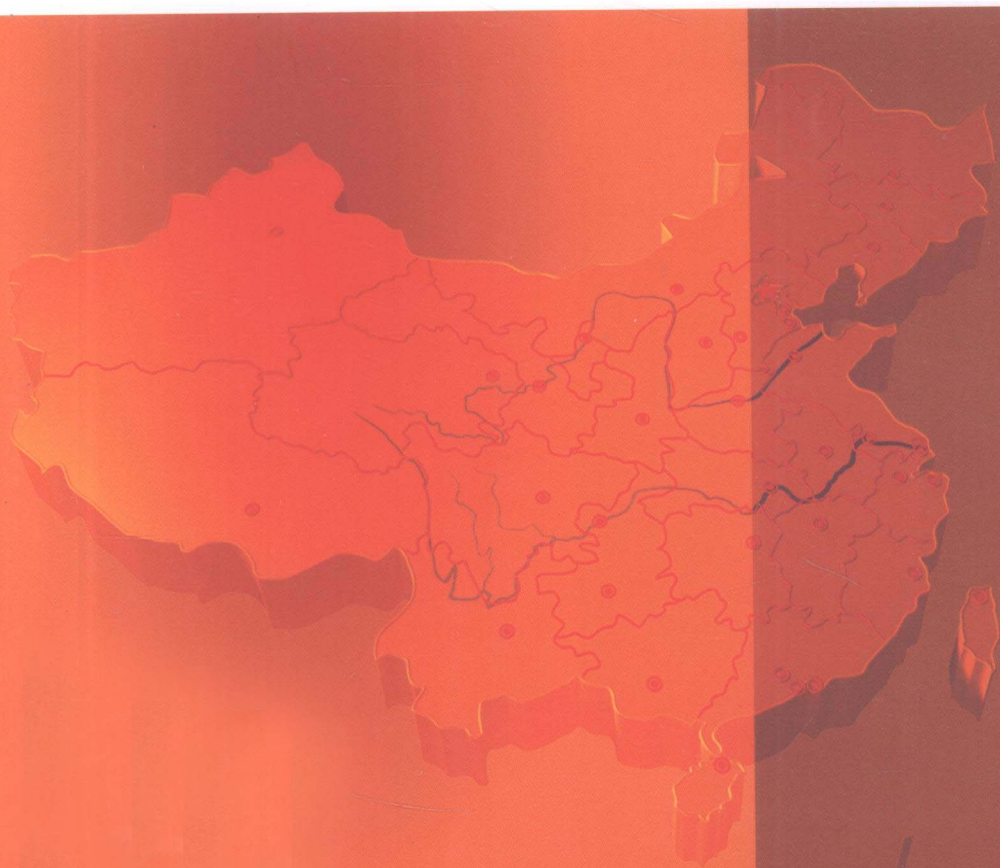


贺学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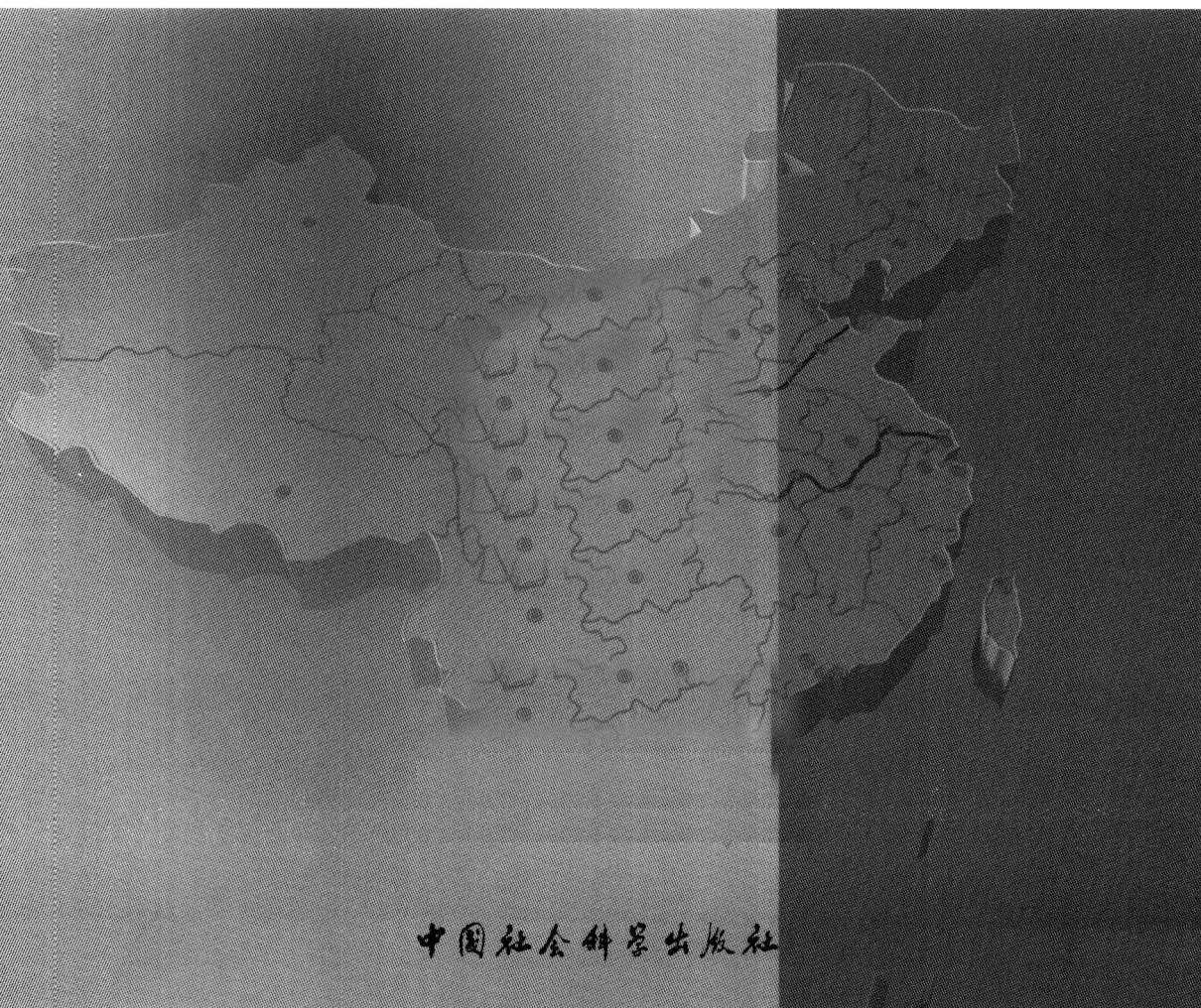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贺学琴 著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 / 贺学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61 - 0745 - 4

I. ①新… II. ①贺… III. ①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905 号

新中国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 贺学琴著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郎丰君

责任校对 杨 晓

封面设计 艾 晶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5632(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 - 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观 / 1	
二 人类探求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过程——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 3	
三 新时期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 16	
四 经济发展观的内涵及确立 / 18	
五 本书研究的重点及意义 / 22	
 第一章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观（1949—1952 年）	23
一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 23	
二 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 / 28	
三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观的贯彻及实践指导作用 / 30	
四 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 / 36	
 第二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发展观（1953—1956 年）	41
一 确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发展观是历史必然 / 41	
二 快速推进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 / 45	
三 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 / 50	
四 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努力 / 51	

第三章 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1956—1958 年）
..... 55

- 一 探索中国式建设道路的经济发展观 / 55
- 二 中国共产党人的求实与创新精神 / 60
- 三 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 63

第四章 “超赶”、“均衡”、“备战” 经济发展观（1958—1965 年）
..... 67

- 一 “超赶式” 经济发展观 / 67
- 二 “均衡” 经济发展观 / 80
- 三 “备战” 经济发展观 / 87

第五章 “抓革命、促生产” 的经济发展观（1966—1978 年） 95

- 一 以“抓革命”来“促生产” / 95
- 二 在继续“抓革命、促生产” 基础上的新的反思与探索 / 102

第六章 调整中改革——新的“调整观”（1979—1984 年） 113

- 一 经济发展观的历史性转折 / 113
- 二 新的“调整观” / 116
- 三 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实践 / 120
- 四 新“调整观” 指导下国民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 / 122

第七章 从全面改革到稳定经济的发展观（1984—1991 年） 125

- 一 全面改革发展目标模式以及改革措施的实施 / 125
- 二 全面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 129
- 三 从全面改革发展观看经济“过热” 现象 / 132
- 四 稳定经济发展观 / 133

第八章 加速经济发展观（1992—2002 年）	139
一 确立加速经济发展观的客观依据 / 139	
二 从经济快速发展观的特点看其基本内容的新突破 / 144	
三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践及辉煌成就 / 149	
 第九章 经济协调发展观（2002 年以来）	 155
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 156	
二 经济协调发展观 / 167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经济协调发展观的 现实体现 / 178	
 结束语	 183
一 历史反思 / 183	
二 几点启示 / 187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197

绪 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向前运动的永恒主题，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便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是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刚刚摆脱殖民奴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加速发展振兴本国经济。时至今日，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发展的潮流势不可当，发展问题依然是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任何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就是共产党人的迫切任务。然而，面对我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我们党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努力把握国情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观。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观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为根据，和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反复多变的认识过程。这些认识中，既有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内容，又有超越现实与可能的空想成分。无论正确或错误的看法，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对经济发展观的历史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把握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也将为我们确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观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展观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发展问题，与之相应的发展观问题也随之产生。只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总体上比较肤浅、简单。进入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

起和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日益深化。真正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形成较为完整的发展观,是在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奴役,实现独立,开始探求富民强国的发展道路,使人们更加注重研究和思考发展问题,一系列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发展”也就成为了当代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专门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展现的现代化趋势和进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发展指的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也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当时还局限于实现工业化,及其在工业化基础上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显然已经不够全面。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通过信息革命由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跃迁过程。因此,发展在今天也就被广泛认为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转型基础上的进步过程。这一进步过程不仅仅指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等诸多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观就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发展实践的改变,对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同的,当然在如何实现社会发展和怎样达到社会发展目的的指导思想上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就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观。

从发展理论兴起时,可以说发展观就成为了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且在所有发展研究和发展理论中处于最高层次,发展观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的追求以及对发展衡量尺度的理解。发展观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什么是发展;第二,怎样发展。前者属于发展认识论,包含了对发展本身及其衡量标准的认识;后者属于发展方法论,包含了对发展的道路及实现效果的评价。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前者对后者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对这两个方面做出回答。

首先,发展观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发展这一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相应地就会有怎样的发展观存在。

因此, 发展观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基础之上, 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 又反作用于指导实践的结果, 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发展观是一个理论问题。

其次, 对发展有什么样的认识, 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然后通过一定的可具操作性的实践方式, 发挥它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作用。因此, 发展观是指导发展实践的基本原则, 是人们观察、思考、解决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依据和指导思想, 它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解决各类发展问题——从宏观到微观, 从战略选择到具体措施上的思想和政策。在不同的发展观指导下, 不仅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能会不同, 而且发展的成本和效果也会有差异, 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正确的发展观会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导向坦途, 错误的发展观则会引向歧途, 最终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说, 发展观对发展的实践会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 发展观又被归结为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只有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了具体的发展实践和世界的发展趋势, 才能树立合理而科学的发展观; 只有在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下, 才会走向成功的发展实践。

二 人类探求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过程——当代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探索和实践, 国外各种发展理论、发展学说、发展观点竞相出现, 可以说是派别林立、学说纷纭。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涉及发展问题的诸多方面。发展理论层出不穷, 发展实践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各种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不断相互作用中, 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因此, 对发展观的研究必须首先确立特定的研究视角或领域。在这些内容庞杂的发展理论当中, 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 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由追求片面经济增长到追求社会全面进步, 由片面的机械论到辩证的系统论的不断革新、不断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经济增长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研究成为了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这些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种情况必然使发展经济学成为发展理论产生和研究的基础。最初的发展研究将视角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理论中的“发展”也主要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发展，人们热衷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增长高速度。因此，在战后的最初阶段，所谓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将发展视同于增长，即“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当时发展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他们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把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也就是说，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这是战后前20年人们对“发展”的理解。

这种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的形成，在理论上继承了早期工业化思想的遗产，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被看做是具有普遍性的通用模式和共同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走发达

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在实践上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物质资本匮乏，只有解决了物质资本的积累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独立和较快的发展。并且人们确信发展的唯一目标是使经济快速增长，一切问题都会随经济增长而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和文化因素完全被排除在发展过程之外，对于物的无限占有欲望促使人相信自己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而自然则是人类任意索取的对象。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在发展实践中，逐渐暴露出其狭隘性和片面性。不仅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努力大多遭受挫折，发达国家在经济“大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单纯经济增长的弊端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使资本主义陷入“滞胀”的困境。在社会领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化，甚至社会动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上，长期对立造成了自然对人的强大反作用。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受到了普遍批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在理论上确认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异。

（二）增长极限论

针对工业化造成的资源耗竭、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觉醒，认识到在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可能会导致滞后甚至退化，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还会产生一些新问题，因此必须同时考虑和计算付出的代价。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立于1968年，主要从事有关全球性问题的宣传、预测和研究活动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不仅正在耗尽地球的资源，而且将生态损害推向自然的调节能力之外，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唯有遏制和停滞的方法才是实现全球平稳的有效手段。

增长极限论所表达的发展观尽管过于悲观，但却警示人类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有力地批判了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人类重新认识发展与未来开辟了新的视角，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可低估。但不可否认的是，“增长极限论”的出发点仍是以物为中心的，仍然没有区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本质区别，社会和人的因素被排除在发展研究之外。此外，“零增长”方案的不现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反思发展观之发展，发展是合目的性的人类自觉意识，追求发展的意识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觉醒。无疑，人们发展经济就是为了创造物质财富、提高生活水平。然而，人类在追求发展时所面临的困境充分说明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短视的；同时，追求经济发展与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一定程度上悖逆了人的全面发展。

(1) 信息传递和交通运输在给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前所未有的视野和选择机会的情况下，各个民族和国家却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浪潮中因为资源稀缺性的日渐严峻而困难重重。资源匮乏的这种现状除了自然禀赋的先天约束外，不能不说与人类追求经济增长的历史踪迹及其相应的理论有关。从19世纪开始，工业化浪潮从欧洲先发国家紧跟资本扩张向世界各地辐射扩散，造成一方面人类创造财富的效率空前提高，物质资料的数量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技术水平的限制与彼此攀比的消费倾向，人均资源的耗费与占用也呈现出加速累进的趋势。同时，先进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资料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使得随时间推移自然增长的人口呈现出“几何级数式增长”，加大了资源总量的消费基数。在无节制的生产与消费的螺旋式推进下，人们逐渐发现某些属于生活源泉的美好事物正在消失，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与人丁兴旺正在给人类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和源于太多人口的资源耗竭、生态恶化以及为争夺资源的冲突与战争，它们不仅影响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而且对全球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

与人类的经济发展历程相呼应，经济问题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中心地位，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议题，而经济学也成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学的发展观是始于18世纪“产业革命”的工业化运动的理论反映，因而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倾向于见物不见

人，只关心经济增长，偏重财富积累，追求收益最大化。这样，一方面是“工业文明”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激发了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给人类的攀比心理以强烈的刺激；另一方面是传统经济学发展观在理论上极力倡导经济高速增长，颂扬工业文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一致使得人们狂热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工业文明观、工业实现观”成为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工业增长成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在这种理论导向和实践示范效应的双重鞭策下，先发国家不得不消耗越来越庞大的资源进行累积性的生产扩张，以维持现有“消费逐浪高”的生活方式；而后发国家与民族因为艳羨先发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及其基于实力的优越感，纷纷以其为楷模，迅速发展生产力，加快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于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利用世界资源与国际市场，凭借其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和生产技术制高点掠夺弱势者的资源与人力；发展中国家则为了追求速度，经常采用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做法，表现为数量增长的粗放型、外延式扩大生产比较普遍，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多。结果使得生态环境加速恶化、资源耗费空前增加、人口基数急剧膨胀。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财富转移、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贫穷与富裕的马太效应，更加剧了人们往昔在财富相对较少时的充实感与满足感。这场世界性的增长角逐所造成的恶果，给予国际社会的有益启示就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也就是说，虽然世界各国的资源禀赋、社会制度、贫富程度、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历史沿革极不相同，但从未来的发展前景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代表人类经济发展历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生态、人口、贫穷、资源、战争以及诸多的国际社会问题，正是曾经被世界视为人类发展范式的增长型资本主义酿造的结果。

(2) 传统发展观之所以悖逆了人的全面发展，从现象层面分析有三个原因：

首先，从人的生存角度看，财富只是人追求幸福的手段，并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的。财富并不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善，因为它只是有用的、为其他目的服务的东西。财富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它对于人类重要程度的有限性。塞内卡认为：“你问多少才是一个人财富的适

当限度?第一,拥有基本的;第二,拥有足够的。”^①也就是说,财富的重要性在满足了生活需要后,就是一个主观随意性很大的概念,积聚财富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经济发展已能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那么个人与社会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就不一定以财富作为决策的依据。而且,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一旦追求财富的欲望与热情超出满足基本需要的界限,就会让人利令智昏,“财富成为一切价值的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富裕的白痴”^②。事实表明,世界上的几个富裕国家不会因为拥有庞大的财富就在人权、民主、男女平等、贫困与肮脏等方面的问题少一些。道理很简单,良好的社会不是仅靠丰饶的物质财富就能建立的,它还需要价值观念、社会公正与公平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协调与制衡。

其次,从人的需要角度看,人的需要是一个多元素、多层次、多向度的动态系统。一定程度上,各元素彼此可以替代,各层次间可以递进、超越,各向度在面临不同的客观情况、战略目标及任务时,其张力会在人的主体性支配下自动伸缩并趋于制衡。人类需要财富也向往财富,但人类的视域绝不限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一个无价的社会应该使人类需要的各元素对称嵌合且浑然一体,需要的各层次梯阶有序且有径可依,需要的各向度主次分明且协调制衡。也就是说,人们需要拥有财富的舒适、便捷与优越,但人们也需要健康、长寿和本真的生活。人们需要蔚蓝的天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壮观;人们需要享受充实生活的乐趣与保持安全祥和的交际氛围;人们需要汲取知识的营养、满足求真的好奇心。

最后,从经济运行的结果看,过度偏重效率、一味追求财富积累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财富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失衡。而不合理的财富结构可能带来负效应(如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奢侈品与必需品、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比例失调等);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引发人们经济上的过度攀比,使人类迷失自我。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的失衡不

① [美]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古罗马] 塞内卡:《致卢奇里论道德的信》,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页。

② [美]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6页。

但会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更严重的是剥夺了许多人的幸福。“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还是对社会不利呢？……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①很简单，财富总量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一定是同步的。虽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能增加财富总量，扩大人类选择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增加人类的福利。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怎样分配和运用财富，为谁生产的问题要比如何生产和生产多少重要得多。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物质财富和人类发展的正比例关系是建立在下述条件的基础上的：提高GDP在社会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比重，增大转移支付以减少贫困。财富最大化过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和社会所作的选择。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是积聚了多少财富。

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悖逆人类的发展，更深层次地说，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其展开的工具目的过于彰显，乃至人及人的主体性作为目的本身被遮蔽，手段与目的之关系被颠倒了。按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说法，人应该生活在自身本质的生存状态，但发达的工业社会本末倒置，把人当做可以支配的工具，所以技术社会对人是一种工具主义化的摧残。另一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则竭力主张建立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健全的社会”，认为人是自身生活的主人，人不应该是他人之手段而应该是自身之目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精神生命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圆满。按照马斯洛的哲学人性观，“人的内在本质”应该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人的“解剖机构”和机能；由遗传因素决定并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全部类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包括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在内的全部精神生活。其中人的本能需要是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质的集中体现，它分为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过渡

① [美] 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6页。

的五种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本能需要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其中最后一个需要才标志着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说明，财富对于人的发展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过去那种经济被视为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尽可能多地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的活动、经济发展被视为单纯地追求物质财富增长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传统观念，受到思想家与理论家越来越多的批评和修正。于是，出现了各种拾遗补阙或革故鼎新的发展观。

（三）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

由于在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再加上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年）遭到失败，人们普遍认识到，仅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反映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随着发展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发展不应局限于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而是全面的和多元化的，而发展的诸目标和诸因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只有从人的发展出发才能囊括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发展的最高目标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一书，此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所谓整体的是指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人的各个方面，又要看到人们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出现的问题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是指各个部门、地区和社会阶级的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则是强调必须通过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当的技术，充分依靠和利用本国的力量和资源，特别是通常被忽视而得不到开发的人力资源。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作为主题，提

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至此，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念开始形成。在书中，佩鲁对传统经济增长发展观与工业化观念提出强烈批判，他试图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上重新审视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以人为中心确立研究视野，从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角度考察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他指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灵巧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①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 A. 佩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人的发展必要性看做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此外，他们追求的也只是机器人的发展——人变成生产和消费的机器，以便增加效力，改善经济。恰恰相反，人应该得到全面、广泛的发展……但已经可以看到，主要根据物质发展看待人的发展程度的观点，是多么狭隘。另外，这种思想充满着过时的错误观念，因为稳固的经济并不等于富裕的经济，更不是依赖于人的需要的经济。”^② “如果我们谈论人的问题的时候（人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也是希望之寄托）只注意人们眼前的物质需要或政治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这就是不可原谅的错误。”^③ 另外，他还提到，任何进步（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其他），如果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也就毫无价值可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先于人类发展或与人类发展不齐头并进的经济的发展。按照这种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最终检验，不是普通的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1987 年，埃德加·欧文斯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中进一步提出：现在该是我们把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的时候了——不仅考虑社会能够变得更有生产力的方式，而且考虑社会应该变得更有生产力的质量，即是说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

① [法] F. 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5—166 页。

② [意大利] A. 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8 页。

③ 同上书，第 89 页。